

明清时期江南清明卜叶习俗与桑叶市场

冯志洁 严火其

(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明清时期,江南蚕桑区普遍存在着清明占卜叶事的习俗,蚕桑户通过各种方式占卜当年桑叶丰歉、叶价高低。这一习俗的形成与传播是当地蚕桑生产兴盛的折射。随着蚕桑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商品化进程,江南桑叶市场不断发展,并涌现出一批专门交易桑叶的特色市镇。叶市价格剧烈波动的特性,让种桑、养蚕的农户以及专事桑叶贸易的经营者都承担着很大的经济风险。作为蚕桑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女性成为经济风险的主要承担者。卜叶正是为了缓释这种风险和压力而产生的民俗事象。这类习俗既反映了农户希望借助超自然力量消灾祈福的心理,也指导着农户调整蚕桑生产规模,推进了江南蚕桑生产发展。

【关键词】江南;蚕桑;卜叶;叶市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9)03-0096-08

The Mulberry Leaves Divination at Clear and Bright and Mulberry Leaves' Markets in Jiangnan in Ming and Qing

FENG Zhi-jie YAN Huo-qi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Abstract: The mulberry leaves divination at Clear and Bright was popular in Jiangnan during Ming and Qing. People divined the output and price of the mulberry leaves. This custom was generated because of the prosperous of sericulture and mulberry production here. By the large-scale, specializa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of sericulture and mulberry production, the mulberry leaves' markets developed. Some town for selling mulberry leaves came into being. The price of mulberry leaves fluctuated extremely. The mulberry planters, the sericulturists and leave sellers both took a big risk. Women often bore the risk as the major workforce. The mulberry leaves divination relieved the pressure and risk. This custom reflected the mentality that people hope blessing by mana. It also guided people adjust scale of production,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sericulture and mulberry production in Jiangnan.

Key Words: Jiangnan; sericulture and mulberry; mulberry leaves divination; mulberry leaves' markets

占卜农事,是一项重要的农业民俗。农事占卜与农业生产紧密相连,同时还包含着岁时节令、民间信仰等多方面的信息,是我们了解民俗生活的一个切入点。

清明既是节气,也是节日。它起源于中国古人观察物候而产生的节气概念,自唐以后逐步融合了时间相近的寒食节、上巳节等节日习俗,进而发展成一个重大节日。在农业生产中,清明也是重要节点。

【收稿日期】2019-01-11

【基金项目】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资助项目“明代江南农业生产中的女性角色变迁研究”(1701155B)

【作者简介】冯志洁(1987-),女,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科技史流动站师资博士后,主要从事社会经济史、农业史和民俗学研究;严火其(1963-),男,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业历史和科学思想史研究。

清明节气是江南蚕桑生产的关键时期,也是资金与劳动力投入最集中的时节。民间俗称“清明大于年”^①。为了祈求好的收成,江南蚕桑区逐渐形成了特有的清明节日习俗,占卜桑叶丰歉就是其中的一项。

明清时期江南蚕桑业的发展,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学者们已对此领域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经济史学者对明清江南蚕桑业的繁盛情况作了详细描述。李伯重通过对比蚕桑生产和水稻生产的劳动力、资本投入得出结论:明清江南地区农业结构发生重要变化,蚕桑生产地位上升,这一改变也是明清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提高的主要途径之一^②。范金民指出,明中期到清中期,相对于全国蚕桑生产不同程度的衰落,江南一隅的蚕桑生产却继续向前发展,而且形成了商业化与专业化的特色^③。

蚕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江南社会生活的改变,一系列与蚕桑有关的民间信仰与文化习俗由此形成并广泛传播。蚕桑民俗也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如蚕神信仰问题就有多篇论著探讨。其中杨虎的《明代江南市镇经济与蚕神祭祀》一文极具启发性。作者将蚕神信仰置于江南市镇经济发展的背景中分析,指出市镇作为蚕桑生产中心,在江南乡村蚕神祭祀中也扮演重要角色;市镇蚕桑业者通过自己的经济支持,推动江南蚕神的祭祀纳入到明代国家祭祀体系中^④。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入手研究蚕桑民俗,找出经济变化如何嵌入社会生活,是深入解读蚕桑民俗的重要路径。

本文从清明卜叶习俗入手,探究其背后深刻的社会经济因素。通过对明清时期江南桑叶市场特性的分析,追寻卜叶习俗形成的经济根源,理解卜叶习俗在蚕桑生产中的社会意义与功能,为深入了解江南蚕桑经济发展史开启新视角。

一、江南清明卜叶活动

明清以来,江南湖州、嘉兴、杭州、苏州等蚕桑生产区普遍存在着清明占卜叶事的习俗。蚕桑户在清明时节通过各种方式,占卜当年桑叶丰歉、叶价高低。地方文献对这一系列活动多有记载,占卜的形式可谓花样繁多。

江南清明卜叶习俗源于古老的农事占卜。浙江嘉兴的王店,村民会在清明前夜“听秤”占卜:“清明前一日谓之清明夜。是晚,如鬼谷子镜听法为之,名曰听秤。卜叶价之低昂、蚕年之丰歉,每验。”^⑤所谓“镜听法”,就是在夜里怀揣镜子走上大街,听路人无意之言,以听到的第一句话占卜吉凶。这是民间流传很久的一种占卜方法,当地百姓借以预测当年桑叶市场价格。在邻近的乌青镇,清明前夜,“蚕家晚膳后出门,窃听人语,以卜叶价贵贱”,乡人谓之“听叶仙书。”^⑥占卜形式与“镜听法”一脉相承。

一些清明旧俗可以衍生成当年叶事丰歉的一种预兆。浙江湖州东部,“清明之日插柳条,以枯荣卜桑叶贵贱。”^⑦门前插柳本就是清明节令的民俗之一,源于早期寒食节习俗。“清明,俗重墓祭,亦有祀于家者。先晚插柳檐上,男女亦戴之。谚云:清明不插柳,红颜成皓首。”^⑧明代中晚期,江南蚕桑户将插柳与卜叶相结合,借助柳叶的枯荣占卜叶价的贵贱。万历年间,长兴蚕户“清明日插柳卜桑叶贵贱,柳叶早瘁

① 民国《乌青镇志》卷19《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23,上海书店,1992年,第575页。

② 李伯重:《“桑争稻田”与明清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二》,《中国农史》1985年第1期。

③ 范金民:《明到清前期江南蚕桑生产述论》,《古今农业》1992年第2期。

④ 杨虎:《明代江南市镇经济与蚕神祭祀》,《农业考古》2014年第1期。

⑤ 光绪《梅里志》卷7《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19,上海书店,1992年,第103页。

⑥ 民国《乌青镇志》卷19《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23,上海书店,1992年,第575页。

⑦ [清]程岱蓀:《西吴蚕略》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97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51页。

⑧ 崇祯《乌程县志》卷4《时序》,《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10,书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95页。

则桑叶贵。”^①其实“柳叶早瘁”可以反映当年的气候状况,因而间接预示着桑叶的长势。

节气所处的月份偏差,也被用来预测一年的农事。由于二十四节气是根据地球在黄道上的位置变化而制定的历法,与依据月相周期制定的阴历月份并不一致。每年清明所处的月份,就被江南蚕桑户用来指导蚕务。湖州南浔地区有民谚:“二月清明蚕等叶,三月清明叶等蚕。”“清明在二月则叶迟,蚕早。在三月则叶早,蚕迟。”^②蚕桑户努力协调阴历历法与节气之间的关系,探索节气对应时间的不同对蚕桑生长的影响。

更为流行的一种占验方式,是通过观察清明前后的天气,预测桑叶丰歉,估算叶价高低。这一风俗以口口相授的民间谣谚为承载,其认同空间随蚕桑生产区域的扩大而蔓延。蚕桑户最为关注的天气征兆,是农历三月三日前后的晴雨。农历三月三日原是中国传统的上巳节,与清明节气时间相近。唐代以后,清明由节气转变成与寒食节有共同假期的节日,同时也吸收了原本上巳节的一些习俗,如踏青等。随着历史变迁,清明节逐渐取代寒食节、上巳节成为一个重要的节日。在民间的岁时节令观念中,清明与三月三时常联系在一起。对于江南的蚕桑户来说,农历三月三日及清明前后的晴雨寒暖直接预示着当年桑叶价格贵贱。民间也由此产生了各种观天问叶的农谚,在明代已经广泛传播。明人谢肇淛曾记载:“三月初三雨,桑叶无人取。三月初三晴,桑上挂银瓶。”^③清以后,地方志对此类谚语记载更为丰富,如:“清明时,桑叶如雀口,其年蚕丝必盛。又以三月三日有雨则贵,四月尤贵。谚云:三日犹可,四日杀我,阴而不雨,则蚕大善。”^④“三月三日晴雨俱主叶贵,阴云不雨,则蚕大熟。谚云:三月三日晴,桑上挂银瓶。又云:三月三落雨,落到茧头白。”^⑤“清明热,只话叶;清明寒,只话蚕。”“清明雀口蚕妇拍手,清明一粒谷蚕妇要哭。”^⑥这些民间谣谚借助天气变化预测桑叶长势,有效指导着乡民的蚕桑生产。

与节气相关的民间谣谚,是广大农民在长期蚕桑生产过程中经验的积累、实践的总结。蚕桑生产对于自然条件(湿度、温度、日照时间)有着很高的要求,清明期间的气候状况直接影响着桑树生长和蚕的饲养。乡民们通过对桑树生长情况的观察不断总结规律,努力探索蚕桑生长与自然节律的关系。这是江南蚕桑区广大农民顺应自然,应对变化,掌控蚕桑生产规律的一种努力。

卜叶活动有时会融入其他更大型的仪式之中,成为仪式的一部分。清明竞渡是嘉兴地区盛行的一种习俗,是祭祀蚕神的一项盛会,遍及各县。嘉兴石门县(崇德),清明时节乡民们举行规模盛大的“龙蚕会”,其间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占问叶价:“清明日……民间洁蚕具,扮蚕娘船,乡人有往划脚船,漾问叶价者。越一日为二明日,农船装设旗帜,鸣金击鼓,齐集龙蚕庙前,谓之龙蚕会。亦击鼓祈蚕之意。”^⑦濮院镇清明日举行“划船会”,又称“闹清明”“摇快船”或“踏白船”,发端于明代。《东畬杂记》记载了濮院划船会的盛况:

自皂林抵万寿山官塘皆濮氏修筑,人称濮家塘,亦称北塘。清明日,乡人每圩各装一船,为划船之会。用松毛作棚,船中鸣锣鼓。一人椎髻簪花,作蚕妇妆,先翻《叶仙诗》,卜叶价之高下;次为把蚕、秤茧、缲丝等事,以卜蚕丝之丰歉。又一人农服作田夫装,先下秧田,此为种秧、踏车、耘苗,刈获、打稻之事,以卜田岁之丰歉,盖《豳风》之遗意。演毕,弄刀剑钢叉以习武事,亦农隙讲武之意。或一人赤体试拳棒,或两人对搏,盖仿古白打之戏。皆会于万寿山、陡门等

① [明]王道隆:《菰城文献》,乾隆《长兴县志》卷10《风俗》,乾隆十四年(1749)刻本,第52页。

② 民国《南浔志》卷31《农桑二》,《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22,上海书店,1992年,第348页。

③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2,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31页。

④ 光绪《嘉兴府志》卷32《农桑》,《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第797页。

⑤ 同治《湖州府志》卷29《輿地略·风俗》,《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第577页。

⑥ 民国《乌青镇志》卷19《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23,上海书店,1992年,第575页。

⑦ 光绪《石门县志》卷11《风俗》,《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1860页。

处,划船数十,往来如织。士女划舟往观甚众。^①

划船会主要集中在濮家塘一带,也被称为“濮家塘船会”。濮家塘是京杭大运河的一部分,包含浙江桐乡皂林至嘉兴秀洲陡门大桥的河段,处于江南桑蚕生产核心区域,是当地蚕桑贸易的交通要道。祭祀蚕神的盛事划船会因而选址于此。声势浩大的划船会,除了竞渡,更重要的是占卜农桑。材料中提到一人扮作蚕妇,用《叶仙诗》占卜叶价。占卜叶价与占卜水稻丰歉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划船会的核心仪式。

江南蚕桑区清明节卜叶活动和预测桑叶丰歉的民间谣谚,自明代以来,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广泛传播,形成一种颇具影响的农业习俗。

二、江南桑叶市场的特征

清明卜叶习俗的形成,其根源在于明清江南蚕桑经济的蓬勃发展,是适应江南桑叶市场周期短、风险高、投机性强等特征的结果。

明中期以后,江南农业生产结构发生深刻变化。蚕桑厚利,促使农户将大量劳力与资金投入其中。蚕桑生产成为江南地区的经济支柱。“农为岁计,天下所共也,惟湖(州)以蚕……官赋私负,咸取足焉。”^②苏州、湖州、嘉兴等地,乡民们上缴赋税和日常开支,大都仰赖于蚕桑。蚕桑成为家家户户的生计所在,其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蚕桑丰歉,于官于民皆利害攸关。

江南蚕桑生产在明中后期走向规模化、专业化、市场化,内部已出现明确分工。种桑、养蚕、丝织的工作分属不同农户,进而产生了各类市场。“蚕桑商品化和专业化的特征,就是桑秧、桑叶、蚕种乃至蚕都已逐步成为商品,在固定的市场出售。”^③专门交易桑叶的叶市应运而生。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桑叶市场日趋拓展。江南蚕桑区涌现出一批专门交易桑叶的特色市镇,并且滋生出专事贩运桑叶的射利群体。据黄敬斌考证,至迟在明代晚期,湖州、嘉兴等地已有叶市普遍存在。叶市交易的区域集中在湖州府东部、嘉兴府西部以及苏州府东南部。其中南浔镇、震泽镇一带是桑叶的主要输入区,嘉兴府的桐乡、石门等地为主要的桑叶输出区,介于南浔和桐乡之间的市镇成为桑叶的重要集散地^④。湖州东部南浔一带是重要的养蚕区,其所出“湖丝”品质为世人称道。由于饲蚕数量庞大,且“栽桑地狭”,本地桑叶远远不能满足蚕户的需求^⑤。该地成为重要的桑叶输入地,所需桑叶多产于嘉兴的石门、桐乡。位于湖州、嘉兴之间的乌青镇借地利之便,叶市贸易发达。濮院镇地处嘉兴石门、桐乡东部。每年桑叶行开市后,苏州震泽等地的买叶船云集濮院^⑥。乌青镇、濮院镇因而成了明清时期江南极具影响力的桑叶市场。

桑叶市场逐步完备,形成了特殊的叶价运作机制。该机制是由蚕桑生产的自身特性所决定的。江南桑叶的亩产量保持在一定范围内。明嘉万时期,吴兴地区“蚕桑之利,莫盛于湖。大约良地一亩,可得叶八十个(每二十斤为一个)。”^⑦即良田一亩得叶约1600斤。另一则记载道出桑叶产量的浮动范围:“大略地之所出,每亩上者桑叶二千觔,岁所入五六金,次者千觔,最下者岁所入亦不下一二金。”^⑧上等地桑

① 民国《新塍镇志》卷25《丛谭》,《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18,上海书店,1992年,第1044页。

② [明]王士性:《广志绎》卷4,中华书局,2006年,第266页。

③ 范金民:《衣被天下——明清江南丝绸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6页。

④ 黄敬斌:《明清以来江南蚕桑区叶市上的远期交易》,《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⑤ 同治《南浔镇志》卷22《农桑二》,《续修四库全书》第7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76页。

⑥ [清]沈廷瑞:《东畚杂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和嘉兴市图书馆合编《嘉兴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浙江社会科学院,1985年,第151页。

⑦ [明]徐献忠:《吴兴掌故集》,《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第770页。

⑧ [明]茅坤:《与甥顾敬韦侍御书》,《茅鹿门先生文集》卷6,《续修四库全书》第134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37页。

叶亩产能够达到2000斤,次地约产1000斤。到了清代,吴兴县通常“每亩必采叶八九十个(叶二十觔为一个)”即亩产1800~1600斤,“中地一亩采四五十个”即1000~800斤^①。桑叶亩产量的浮动差距,一方面取决于土壤条件和栽培技术,另一方面就是年年变化的气候因素,后者影响往往更为突出。

在长期蚕桑生产实践中,乡民们对于养蚕数量与桑叶需求量之间的配比关系,已了然于心。根据当时文献所载:“凡蚕一斤,用叶百六十斤”^②。“地得叶,盛者一亩可养蚕十数筐;少亦四、五筐;最下二、三筐。”^③“每蚕一斤,自小蚕至上山约食叶一百六十斤,每筐则食叶二百斤。”^④

比起单纯计算桑叶需求总量,选择准确的入市时机更加重要。蚕在不同的生长时期食叶量有很大差异。当蚕进入大眠后,重量是最初蚁蚕的2000余倍,食叶量明显增多。“是时少叶一分,即少丝一分,食叶愈多,作茧愈厚”^⑤。饲蚕的叶量直接关系到日后出丝数量和质量。蚕户在短时间内需要大量桑叶。大眠以后的十来天,蚕户急切地通过市场购买大量桑叶:“卷帷看蚕蚕尽起,求食纷纭曲簿里。青青采得新叶归,缘枝食叶疾于飞。须臾连筐食更尽,从头添叶宁令饥。饷蚕粗了到门前,偶值邻姑采叶还。闻道市头叶大贵,只论有叶不论钱。东家典衣还去买,西家新妇耳无环。归来絮语问夫婿,细数依家蚕叶计,不愁叶少便欢然,留得银钗长压髻。”^⑥蚕户们迫切希望掌握叶价走势,适时入市。

“桑,蚕之本也。育蚕必先治桑。”^⑦明代初期,朝廷大力推行“课民种桑”,太湖沿岸的苏州、嘉兴等地桑林遍布。苏州吴江境内,明洪武二年,桑树“凡一万八千三十三株。宣德七年,至四万四千七百四十六株。”^⑧入清以后“丝绵日贵,治蚕利厚,植桑者益多。乡村间殆无旷土。春夏之交,绿阴弥望。通计一邑,无虑数十万株云。”^⑨“多种田不如多治地”,日益丰厚的回报,促使更多农民改稻田为桑地,不断扩大种桑规模。由于生态环境的不同,江南各地乡间也选择了不同的农业生产形式。吴江、嘉兴等地很多农户大规模栽桑,他们不再只为自家养蚕,而是弃蚕卖叶,依靠桑叶贸易获取更大的经济收益。对于种桑户而言,全年赋税及家庭生活开支皆依赖于卖叶的收入。市场叶价不好,则一年的生活将举步维艰。如果惜售,则可能错过蚕期,一钱不值。桑户一年最期盼的就是蚕入大眠,蚕户涌入市场的这段时间。

射利的叶市经营群体,也要在每年开市之前评估叶价、谋划资金投入。这一时间出现的桑叶价格,密切关系到养蚕户、种桑户、桑叶经营户三方的利益。由此,叶市交易成为了一场与时间的竞赛。叶市持续时间短暂,前后约十数日。桑叶价格在短时间内大幅波动。

在乌青镇,叶市交易被集于镇上“作叶”的牙伧操纵,价格瞬息万变:

蚕向大眠,桑叶始有市。其预期市定者,谓之梢。盛时有经纪主之,名青桑叶行,无牙帖、牙税,评价不论担,而论个,个凡二十觔。市价早晚迥别,至贵每十个钱至四五缗,至贱或不值一饱,议价既定虽黠者不容悔,公论所不予也。^⑩

在濮院镇,叶市有固定的开市时间,价格随时间而变化。“凡三市曰:头市、中市、末市。每一市凡三

① [清]高銓:《蚕桑辑要》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97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81页。

②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9页。

③ [清]张履祥:《补农书》,《杨园先生全集》卷50,中华书局,2002年,第1411页。

④ 民国《双林镇志》卷14《蚕事》,《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22,上海书店,1992年,第546页。

⑤ [清]吴烜:《养蚕说》,《续修四库全书》第97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86页。

⑥ [清]程岱蓀:《西吴蚕略》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97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55页。

⑦ [清]高銓:《蚕桑辑要》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97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78页。

⑧ 乾隆《吴江县志》卷5《物产》,《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第155页。

⑨ 乾隆《吴江县志》卷5《物产》,《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第155页。

⑩ [清]程岱蓀:《西吴蚕略》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97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55页。

日,每日市价凡三变,曰早市、午市、晚市。”^①不仅每日叶价不一,一日之内早晚叶价都有差别。叶价的变幻莫测给蚕桑户带来极大的经济风险。深谙低买高卖之道的商人则充分利用叶价的波动进行投机,希望掌握最好时机谋求利益最大化。周期短、风险高和投机性强是明清时期江南叶市的重要特征。

值得重视的是,随着蚕桑业市场化进程,女性成为蚕桑生产中经济风险的主要承担者。整个蚕月,妇女们殚精竭虑,伺蚕的每一个环节都不敢放松:

自头蚕始生,迄二蚕成丝,首尾六十余日,妇女劳苦特甚。其伺之也,篝灯彻曙,夜必六、七起……富室无论已,贫家所养无多。而公家赋税、吉凶礼节、亲党酬酢、老幼衣著,唯蚕是赖,即唯健妇是赖。顾利殊有限,丰收三、五载,汔可小康。如值桑叶涌贵,典衣鬻钗,不遗余力。蚕或不旺,辄忘餐废寝,憔悴无人色,所系于身家者重也。^②

女性在衣不解带辛勤伺蚕的同时,还需要考虑买叶的资金筹措。一旦叶价高昂,就要典当衣物、首饰换取买叶钱。由于“公家赋税、吉凶礼节、亲党酬酢、老幼衣著,唯蚕是赖,即唯健妇是赖”,蚕妇几乎是叶价骤变的直接面对者。清初王士禛在听闻“丁酉夏有民家养蚕,质衣钏鬻桑。而催租急,遂缢死,其夫归见之亦缢”的故事后,痛作《蚕租》诗,尽诉其情^③。遭遇桑叶不周时,妻子质钗鬻襦换钱买叶;面对里正催租频急,妻子不惜生命,竭力为家庭解除困境。女性直接承担了蚕桑生产的压力和风险,成为一个家庭的支柱。因此,女性对于叶价波动尤为敏感,对桑叶丰歉最为关注。

三、卜叶习俗的功能与江南桑叶市场

明清以来,在乌青、濮院等极具影响力的桑叶贸易市镇,商人、叶户、蚕户纷纷聚集于此,市场机制业已完备。叶市的交易时时刻刻暗藏着风险。面对变动不居的叶价,无论是作为桑叶提供者的叶户,还是作为桑叶需求者的蚕户,抑或企图谋利的中间商们,内心都充满着祈盼和焦虑。卜叶民俗正是在这样的心理基础上产生的,也因此有了区别于一般农事占卜民俗的特殊意义。

农事占卜在中国历史悠久,是我国重要的农业民俗之一。民俗学家钟敬文曾经指出,人们通过农事占卜习俗,“希望借助超自然的神灵庇佑,获得幸福;或对危害人类的自然灾害的恶神,予以禳解或消除。”^④这是农事占卜的一般意义与功能。卜叶习俗是适应明清江南叶市特性而产生的,其社会功能更为重大。

首先,卜叶习俗是明清江南叶市周期短、风险高、投机性强背景下蚕桑户采取的应对机制,具有缓解心理焦虑的积极作用。叶市时间短,价格波动剧烈。叶户与蚕户在桑叶交易中都承担着巨大风险。有人在短短几日内靠卖叶获利数倍,也有人一夕间倾家荡产:

凡无叶而交易者,谓之空头。叶价贱,而望其长者,谓之做大眠;价贵而望其短者,谓之做小眠。或贱买而贵卖,或贵买而贱卖。市侩以文射利,或顷刻获利数倍,或顷刻而折本数倍,有以此起家者,亦有以此倾家且殒命者。凡卖叶与蚕户,待其做丝而收钱者,曰敲丝车钱,较市价长一、二分,万一蚕户歉收,得而复失者亦有之。叶仙诗句甚俚鄙,乡人以卜叶价,却有应验。^⑤

① [清]沈廷瑞:《东畬杂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和嘉兴市图书馆合编《嘉兴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浙江社会科学院,1985年,第151-152页。

② [清]程岱蓀:《西吴蚕略》卷下,《续修四库全书》第97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62页。

③ [清]王士禛:《带经堂集》卷3《渔洋诗》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4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9页。

④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3页。

⑤ [清]沈廷瑞:《东畬杂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和嘉兴市图书馆合编《嘉兴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浙江社会科学院,1985年,第151-152页。

面对动辄数倍的价格差异,蚕桑户的压力比一般农业生产大得多。在如此大的心理压力下,他们只好借助外力,在不确定中寻求些许心理安抚。

清明卜叶的结果给广大蚕家妇女带来极大的心灵抚慰和生产信心。清代桐乡乡贤在《桑叶叹》中将蚕家妇女和贩叶商户在桑叶价格剧烈波动时的情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吴地养蚕视种桑,桑多满野蚕满筐。乡村欲问蚕多寡,入市先探价低昂。
今春雨足桑畴沃,雀口初开鼠耳长。绿阴四合天不见,入望但惊枝远杨。
小梯缓摘幸细雨,大担挑归歌夕阳。一树已足三眠食,余干且充原蚕粮。
即或买携钱于百,船载有余沽酒浆。蚕丁无忧蚕妇喜,那知市有人悬梁。
市人贩叶非蚕食,以此射利纷且狂。去年蚕多叶最少,价视今年百倍强。
红蚕满箔青桑尽,市价日腾心慌忙。长塘远搜飞桨集,村庙号召击鼓镗。
贩者居奇傲里闾,村姬束手哭蚕房。彼既贱买得贵价,尚似见旱为曲防。
百计拗折勒重价,十分利益归橐囊。狙佞狡态类如此,坐享厚储谁敢当。
岂意好还在天道,今年叶非昔可方。处处求售人莫顾,家家催剪枝恐伤。
以母求子母且失,破家荡产犹难偿。仓皇不啻丧家狗,窘迫无殊入槛羊。
至此求死不可得,计穷力竭惟逃亡。同此青青枝上叶,天时人事偏改常。
倏来之财何可狃,生之杀之反复手,叶兮叶兮犹其有。^①

桑叶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其风险性亦随之加大。女性是风险和压力的直接承担者。在如此巨大的风险面前,人们需要借助一些神秘力量抚慰心灵,缓解压力。卜叶习俗的扩展成为江南桑蚕区广大人民抗御风险,追求更大收益,努力扩大生产的精神调适。

其次,卜叶民俗的特殊意义还在于,蚕桑户会根据卜叶结果调控蚕桑生产规模,指导择机入市。

清明是每年养蚕的开始,从这时起蚕户就忙着出蚁饲蚕。通过在清明观察天兆、占验桑叶丰歉得出的卜叶结果,蚕户可以控制养蚕的规模。叶价低就多养蚕,叶价高则少养蚕或弃蚕转而囤叶。因此,清明成为占卜农桑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明人在朱国祯《涌幢小品》中记载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

谚云:“仙人难断叶价。”故裁与秒最为稳当。不者,谓之看空头蚕,有天幸者,往往趣之。余邻家章姓者,豫占桑价,占贱即畜至百余斤。凡二十年无爽。白手厚获,生计遂饶,鼓乐赛谢以为常。一日赛毕,有妇人,矮而肥白,求斋,卧于地,不肯去。其家内外醉饱,得意甚,厌之,叱曰:“亟去!毋得聒扰。”则应曰:“我与汝曾祖母有连,岁为汝应卜助,生计不啻足矣,一斋何有。而慳至此!”匍匐将入门,众恚甚,蹴之,忽不见,且骇且疑。其佛堂忽有声,曾祖母牌已裂为二。盖祖母故好善,每见裸蚕,必致暖处护其生,俟生翼翔去乃已。没已数十年矣,矮妇之祥,或在于此。以后卜吉而畜者,其价每每相左。初犹得失半,而后失者居多,最后价腾十倍,弃其蚕于水。家亦随耗矣。^②

故事的主人公通过卜叶预测当年叶价,调整养蚕规模,二十年无误,获得暴利。但是,因为得罪了蚕神,占卜不再灵验,家产全部败光。这充满神秘主义的故事将叶市贸易的风险性和投机性展露无遗。“豫占桑价,占贱即畜至百余斤”则明确了卜叶习俗具有指导蚕桑生产的功能。

清明时节的卜叶问价行为通常是蚕家妇女所实施,占验所得常常成为入市时机的判断:“树桑墙下地不多,蚕食不足如叶何。邻翁明日向乌戍(乌镇),顾语夫婿无蹉跎。叶行早晚价不一,秒迟秒早宜猜

① 光绪《桐乡县志》卷7《食货志下·农桑》,《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专辑》23,上海书店,2011年,第319页。

②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9页。

摩。清明插柳妾曾卜,今年平稳靡有他。但愿初贵后时贱,彼做叶者空婆婆。当其贵时依有叶,墙阴屋角枝猗傫。待至蚕长叶已贱,叶船两两门前过。”^①蚕妇根据清明插柳卜叶的结果,把握去叶市购买桑叶时机。

清明卜叶习俗在很大程度上是百姓对于蚕桑生产与物候状况关系的总结,是经验累积的结果。共同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是这一民俗在江南广泛传播的基础。明清江南桑叶市场的特征,决定了卜叶习俗的特殊意义。叶市交易的短期性及巨大的风险性、投机性令蚕桑户更加依赖于清明卜叶。清明船会、查看《叶仙诗》、占验桑叶等近似神秘的民俗活动,顺应了农户趋吉避祸的心愿,在充满着风险的养蚕期给予了蚕桑户极大的心灵抚慰,形成了有力的精神支撑。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卜叶习俗对推进蚕桑规模化生产发挥了积极的影响。

[参 考 文 献]

- [1] 李伯重.“桑争稻田”与明清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序的提高——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二[J]. 中国农史, 1985, (1).
- [2] 范金民. 明到清前期江南蚕桑生产述论[J]. 古今农业, 1992, (2).
- [3] 杨 虎. 明代江南市镇经济与蚕神祭祀[J]. 农业考古, 2014, (1).

(上接第 113 页)

[参 考 文 献]

- [1] 梁方仲.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 [2] 曹树基. 中国移民史(第六卷)[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 [3] 彭雨新. 清代土地开垦史[M].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90.
- [4] 江立华, 孙洪涛. 中国流民史·古代卷[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1.
- [5] 陕西省农牧厅. 陕西农业自然环境变迁史[M]. 西安: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6.
- [6] 田培栋. 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M].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 [7] 田培栋. 陕西通史·经济卷[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 [8] 陈世松. 移民文化与当代社会 纪念湖广填四川 340 周年论文集[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9.
- [9] 萧正洪. 清代陕南种植业的盛衰及其原因[J]. 中国农史, 1989, (1).
- [10] 衣保中, 朱正西. 宋代广西地区移民与农业发展研究[J]. 中国农史, 2016, (3).
- [11] 赵常兴, 张小明, 秦敏. 清代陕南移民及其对当地经济的影响[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1).
- [12] 陈良学, 邹荣础. 清代前期客民移垦与陕南的开发[J]. 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8, (1).
- [13] 谭作刚. 清代陕南地区的移民、农业垦殖与自然环境的恶化[J]. 中国农史, 1986, (4).
- [14] 张海瀛. 论清代前期的奖励垦荒与蠲免田赋[J]. 晋阳学刊, 1980, (1).

^① 同治《南浔镇志》卷 22《农桑二》,《续修四库全书》第 71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 376 页。